

主编 [美] 高 柏 执行主编 甄志宏 冯秋石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制度变迁与全球化

[美] 约翰·L. 坎贝尔 著

姚 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制度变迁与全球化

[美] 约翰·L. 坎贝尔 著

姚 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迁与全球化/(美)坎贝尔(Campbell, J. L.)
著;姚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ISBN 978-7-208-09168-9

I. ①制… II. ①坎… ②姚… III. ①制度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778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制度变迁与全球化

[美]约翰·L.坎贝尔 著

姚 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47,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68-9/F·1934

定价 32.00 元

丛书顾问委员会成员

(按姓氏字母排列)

蔡 禾

李培林

李友梅

刘少杰

刘世定

沈 原

孙立平

周长城

DiMaggio, Paul(保罗·迪马吉奥)

Dobbin, Frank(弗兰克·道宾)

Fligstein, Neil(尼尔·弗雷格斯坦)

Powell, Walter(沃尔特·鲍威尔)

Soskice, David(戴维·索斯凯斯)

Swedberg, Richard(理查德·斯韦德伯格)

Zelizer, Viviana(薇薇安娜·泽利泽)

中文版序言

欣闻《制度变迁与全球化》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写作本书的灵感部分来自我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和中欧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研究,但我认为本书提出的某些观点,对于最近中国的情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首先,众所周知,一种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没有制度的支持,市场不会自动的形成,而其中来自国家的制度支持尤为重要。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经开始了这种制度建设过程,并且巩固和促进了新的经济市场的发展。但是,这种制度建设过程要牵涉很多政治问题,包括共产党精英、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外国投资者、工人等等之间不同程度的竞争、谈判和妥协。总之,中国的经验再次表明,制度建设和市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政治过程。

其次,制度建设并非是把某种所谓最好的制度化做法整体照搬到中国社会中。相反,中国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审慎地寻找适当的制度形式,进行转化并使之与中国既有的制度化做法相结合。例如,破产法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破产法在任何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支柱之一。中国领导人先是仔细研究了不同国家的破产法,以及国际准则和优良的破产法的基准,然后才精心地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破产制度。中国代表团还周游世界,研究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以在中国建立一套更加现代的福利制度,减轻国家由于市场和工业化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某些不平等现象。换言之,制度变迁是一种把不同制度要素组织起来实现创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国外制度模式的不同片断,与中国既有的、过去存留下来的制度结合在一起。

正如本书所言,在我看来,这种制度组合过程是所有政治经济系统中十分普遍的制度建设模式,但人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一点。

最后,本书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尽管全球化向各个国家提出了各种要求和施加了各种压力,包括国际资本外逃的威胁日益增加、实行低税收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限制政府的开支、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放松管制,等等,但是各个国家并不会一致地接受这些要求——虽然有些人预测说会如此。中国的情况进一步佐证我的这一主张。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制度空间已经建立起来,并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发展,但是随后并没有出现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政府开支也并没有显著的减少。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只是从新自由主义方案中选择了某些零碎片段,并加以裁剪与中国传统制度相结合。我们看到,中国还吸收了其他一些模型的因素。在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这一举动是向凯恩斯主义而非新自由主义靠近。我们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制度变迁的这种组合特点。

我非常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本书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继续发生的各种显著的制度变迁。当然,在某些地方我的主张可能与中国的经验不相符,我真心希望中国学者能以此为契机,推进我们的制度变迁理论。

约翰·坎贝尔

2009年11月

献给妻子凯西 (Kathy)

前 言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社会科学家们在研究制度与制度变迁问题时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同时也讨论全球化问题,特别是讨论“全球化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常见的主张。本书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制度分析》(普林斯顿出版社,2001)一书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直接拓展。《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制度分析》一书是由我和我的同事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奥弗·K. 彼德森(Ove K. Pedersen)共同编写的,该书收入了一批富于开拓精神的学者所写的文章,并试图明确各种制度研究范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20世纪晚期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正是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洞悉了各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范式——即今天我们常常提及的那些新制度主义——存在的诸多共同问题。

多年来,我在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解释美国与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直试图解决新制度主义存在的共同问题。当然,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还源于我在几所大学工作与研究时所撰写的论文,以及我所做的讲座和所组织的研讨会。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丹麦社会科学研究会向我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两度成为丹麦公共组织与管理中心的访问学者;感谢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聘我为客座教授。感谢上述机构向我提供的经济资助与研究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该学院以高级职员补助金的形式向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直接的资助。

正如本书所阐述的,制度分析存在如下三大传统: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历史的制度主义,以及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接受的是历史的制度主义的训练,因为在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史的制度

主义颇为流行。但是后来,我逐渐欣赏其他的制度主义范式,当然我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支持这些范式。因此,本书是以如下一种信念为基础的:各种制度主义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如果能够关注他人的研究,即使他人的研究处于自己的研究范式之外,也会获益良多。特别是我认为,各种范式的制度主义者存在着诸多共同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整体上把制度分析推向前进。不过,并非所有的制度主义者都支持这种折衷的立场,特别是那些主张“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某一种范式推向极限,并挑战和反对其他范式’”的学者,尤其可能反对这种折衷立场。当然,我尊重但并不赞成这种极端做法。不过,长期以来制度主义者们恰恰就是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我认为,现在已经是寻求各种制度主义范式的共同基础,并促进彼此交汇融合的时候了。这首先就要求我们承认我们面临共同的问题,然后努力确定和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本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至于本书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我要感谢多年来很多人的评论、建议、质疑和讨论。他们是丹尼斯·安东尼(Denis Anthony)、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弗朗西斯科·杜丽亚(Francesco Dunia)、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爱娃·弗多(Eva Fodor)、鲍勃·弗斯特(Bob Forster)、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彼得·哈尔(Peter Hall)、道格·赫塔索恩(Doug Hechtathorn)、彼得·贾尔(Peter Kjaer)、乔尔·列温(Joel Levine)、埃利诺·刘易斯(Eleanor Lewis)、迈克尔·马西(Michael Macy)、乌利·迈尔(Uli Mayer)、倪志伟(Victor Nee)、克劳斯·尼尔森(Klaus Nielsen)、汉斯·P. 奥尔森(Hans Peter Olsen)、查尔斯·佩鲁(Charles Perrow)、迪特里奇·鲁斯奇迈尔(Dietrich Rueschemeyer)、威维恩·施密特(Vivien Schmidt)、亚当·斯恩格特(Adam Sheingate)、吉姆·肖奇(Jim Shoch)、布拉德·肖尔(Bradd Shore)、安德鲁·斯兰克(Andrew Schrank)、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亚谢明·索伊萨尔(Yasemin Soysal)、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劳恩·斯泽兰尼(Loan Szelenyi)、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那些参加制度分析讨论会的研究生们。我要感谢我的同事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约翰·A. 哈尔(John A. Hall)、埃得加·克什尔(Edgar Kiser)、奥弗·彼德森(Ove Pedersen)、W·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马克·斯奈伯格

(Marc Schneiberg),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评论员伊丽莎白·S. 克里蒙斯(Elisabeth Clemens)和尼尔·弗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 他们不吝时间, 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手稿, 并提供了睿智的建议。我与奥弗·彼德森、迈克·史密斯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交流, 我们之间富有成果的讨论, 对我形成本书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帮助, 并使本书得以面世。因此, 我也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先生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曾多次给我鼓励和支持, 丹麦 Akademisk Forlag A/S 出版社的编辑卡斯頓·乌尔夫(Carsten Wulff)先生也是如此, 他不厌其烦地让我修正本书丹麦版译文。我在读研究生时, 首先向我介绍制度分析的是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先生, 我始终认为这是他给我的足以珍藏一生的礼物。另外,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 我的妻子凯西·谢丽波(Kathy Sherrieb)除了给我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建议外, 还始终如一地向我提供了各种难以计算的支持。我要把本书连同我的感激与爱意一起献给她。

约翰·L. 坎贝尔

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莱姆镇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前言 / 1

第 1 章 制度分析存在的问题 / 1

第 2 章 制度变迁的方式问题 / 32

第 3 章 制度变迁的机制问题 / 62

第 4 章 思想观念问题 / 89

第 5 章 全球化问题 / 123

第 6 章 我们从此走向何处 / 168

附录 各种国家子群体的税收水平与税收
结构分析 / 186

图表目录

图 2.1 美国 1916—1986 年个人收入税的
平均税率、累进税率和人口覆盖
率 / 52

图 2.2 美国 1916—1986 年间平均税率、累
进税率和人口覆盖率的聚类分
析 / 53

图 4.1 不同行动者及其思想观念 / 99

表 1.1 理性选择的、组织分析的 and 历史的新
制度主义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 10

表 4.1 思想观念的类型及其对政策制定的
影响 / 92

- 表 5.1 OECD 18 个成员国家的总体税收岁入(占 GDP 的百分比) / 137
- 表 5.2 OECD 17 个成员国家中央政府的三种税收岁入(占整个政府岁入的百分比) / 138
- 表 5.3 OECD 18 个成员国的公司收入税(占整个政府岁入的百分比) / 140
- 附表 1 补救型福利国家、基督教民主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总体税入(占 GDP 的百分比) / 187
- 附表 2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与合作市场经济国家的总体税入(占 GDP 的比重) / 189
- 附表 3 补救型福利国家、基督教民主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中央政府税收岁入(占整个政府岁入的比重) / 190
- 附表 4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与合作市场经济国家各类税收(占中央政府岁入的比重) / 192
- 附表 5 补救型福利国家、基督教民主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公司收入税(占整个政府税收岁入的比重) / 193
- 附表 6 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与合作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收入税(占政府总岁入的百分比) / 194
- 参考文献 / 197
- 索引 / 231
- 译后记 / 246

第 1 章 制度分析存在的问题

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包括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监督与实施机制以及意义系统,并界定着个人、公司、工会、民族—国家以及其他组织得以运行、相互作用的背景。制度是从各种斗争与讨价还价中产生的设置。它们代表和反映其制定者的资源和权力,同时反过来又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权力的配置。制度一旦被人们创造出来,就会成为外在于人们的强大力量,并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所在的世界之意义,以及他们的行为在他们世界中的意义。制度对各种冲突起着疏导与调节作用,进而确保社会的稳定。

如果没有稳定的制度,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变得艰难。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东欧国家 1989 年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过程中,旧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产权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突然弱化或崩坏,导致了各种可怕的混乱。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生活突然被数十个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淹没,他们之间争权夺利,时而化敌为友,时而化友为敌,没有形成稳定的同盟关系。各种经济领域中则充斥着黑手党、骗子以及其他不三不四的人,在这些人的操纵下,经济活动变得难以预测、极不确定,有时甚至充满了危险。像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样简单的事情,都突然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因为极有可能在途中受到歹徒的袭击,或者遭遇某些突发事件。因此,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成了后共产主义国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Elster et al., 1998)。应该说这种事情丝毫不值得奇怪。因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艾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等学者早就指出过,如果没有牢固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的。^[1]这也是制度分析之所以成为北美和欧洲社会科学中一种重要

的研究视角的原因之一。

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制度会发生变迁。它们有时会发生急剧的变迁，有时又只是缓慢地演化和渐进地变迁。当然它们有时又可能十分稳定。本书主要就是探讨制度变迁这个问题，包括当我们看见制度发生变迁时，如何认识这种制度变迁属于哪种类型；如何更好地理解导致该种制度发生变迁或者促使其保持稳定的因素或力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拥有不同社会科学和知识背景的学者，在探讨制度变迁问题时，都面临着共同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问题。制度分析正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制度变迁问题，才不断地受到人们的批评（如 Lieberman, 2002; Scott, 2001:181; Thelen & Steinmo, 1992:15）。我们之所以有时候对制度变迁的认识会出现错误，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还在于把制度的演化性发展误解为革命性转型，以及没有深刻理解制度变迁各个阶段之间常常存在很高程度的连续性，甚至在 1989 年之后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发生的各大事件之间，也存在很高程度的连续性。同样，本书试图直面并矫正当今制度分析所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本书把各种制度分析范式的思想洞见整合在一起，以期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

然而，本书还直面另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全球化现象。关于全球化的研究著述现在已经非常多了，并且其中大多数都认为，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引起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革命性的变迁。^[2]有些学者公然宣称，全球化使制度分析不再有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很多研究都过高估计了全球化所引起的制度变迁的程度。其中很多研究根本就没有进行制度分析，或者没有沿着本书所提到的那些线路进行深入的制度分析，就做出了这种武断的判断。

因此，概括起来，本书主要想完成两件事情。其一，本书试图界定制度分析所存在的那些关键而重要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概念、方法与理论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工具有助于增强制度主义的分析力量，特别是增强其理解制度变迁的力量。其二，为了证明这些工具的有用性，本书运用这些工具来研究全球化现象，以显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关于全球化之类的现象或者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现象是如何导致制度变迁这一问题的理解，并相应地减少我们的误解和分歧。

但是，我所说的制度分析指的是什么呢？当今学术界存在三种主要的制度分析范式，即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和历史的制度主义。^[3]更准确地说，我所说的制度分析，通常指的是制度分析在当今的这些新形式，而其中每

一种新制度主义都是从某种老制度主义中演化和生发出来的。每一种新制度主义都横跨了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领域。制度主义者所探讨的对象十分广泛,诸如艺术博物馆等文化组织的出现与发展、现代公司的兴起、工会的组织化、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采纳与使用、公司治理形式的迭代演进、产权制度的转型、经济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经济、财政、社会、技术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此外,还包括社会运动的发展、不同群体保护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差异、国家和国际安全机制的运行、公民权利的扩散、世界文化的传播、全球化的影响后果,等等。这些研究充分证明了制度分析的有用性。[4]

尽管这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之间有着很多共同的见解和主张,但是它们各自的支持者就哪一种范式是最好的分析视角,以及每种范式各自的优劣等问题而争吵不休(如 DiMaggio & Powell, 1991; Kiser & Hechter, 1991; Thelen & Steinmo, 1992)。一些制度分析者甚至对哪些制度最为重要也难以达成共识。例如,某些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者,把制度界定为一种策略均衡。他们所说的策略均衡,指的是如下一种情形:即使存在替代策略,并且能够预测如果采取不同行为他人会做出何种反应,也没有人愿意单方面选择改变其当前的行为(Bates 等, 1998: 8—10; Calvert, 1998: 57—60)。另一些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者则认为,制度是一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促使行动者遵守这些规则的监督和奖惩机制(North, 1990: 3)。历史的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建构人们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程序(Thelen & Steinmo, 1992: 2)。而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者尽管承认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但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是那些人们共有的、视为当然而接受的、非正式的文化框架以及脚本和认知图式(Jepperson, 1991)。[5]

不过,尽管各种制度主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在制度分析中发起第二次运动,即要求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探讨这些范式相互补充和联系的各种可能方式(如 Campbell & Pedersen, 2001b; Hall & Taylor, 1996; Immergut, 1998; Peters, 1999: 149—151; Such-

* 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民权运动的压力下,为缓和种族矛盾、解决由来已久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补救性行政措施。——译者注

man, 1997; Thelen, 1999)。人们期望通过这样一种对话,可以调和各种范式,并找到一种新的、更加统一的理论视角来研究制度。

5 本书的预设前提是,制度分析的第二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承认这三种范式存在一系列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制度主义者如果认识到存在这些问题,就会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和共同危险,都比他们以前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鉴于稍后我们将要讨论的那些原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制度分析就不太可能超越其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太可能有重大的进展。在这些共同问题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制度变迁的模式问题、制度变迁的机制问题,以及思想观念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全球化则是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与上述三个问题属于不同的类型。^[6]本书将逐个探讨这些问题,并努力指出我们如何矫正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比较了某种制度主义范式相对于另一种范式的优劣,但实际上还没有学者详细探讨这些范式存在的上述共同问题,更没有学者试图提出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办法。在本章,我先扼要阐述每个问题,介绍一下本书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组织起来的。

首先,制度主义者讨论了描述制度变迁的最恰当方式。例如,我们之中一些人主张,制度变迁往往遵循的是一种演化模式,其特征就是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由较小的、渐进的、增量的变迁逐渐积累成较大的变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制度变迁更多的是遵循间断均衡模式或间断演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模式更具革命色彩而较少演化色彩,因为这些模式具有如下重要的特征:先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均衡、稳定或演化时期,后来这一时期被某种危机突然打破,很多事物突然陷入混乱和无序,接着一套崭新的制度安排被建立起来,然后这种新的制度保持均衡或者又进入另一个较长的演化周期(Blyth, 2002: 第1章; Hay, 2001; Krasner, 1984)。我们除了在制度变迁方式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外,还常常都没有充分解释这类或那类制度变迁模式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制度主义对于重要的制度变迁程度还没有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其结果是,我们难以确定制度变迁在某一特定阶段实际上属于演化的、革命的或者其他什么程度的变迁。我们关于20世纪中某些最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实际上就处于这种状况。例如,对于后共产主义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变迁,是达到了与共产主义时代明显的、革命性的决裂的程度,或者只是演化性的、仍然与过去的制度具有强烈的相似之

处,我们进行了很多讨论,但是看法却各异(如 Campbell & Pedersen, 1996; Crawford & Lijphart, 1995; Hanley 等,2002; Stark, 1996)。第2章探讨制度主义者所说的制度变迁概念的含义,以及当各种制度变迁发生时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认识其属于哪一种变迁模式等问题。如果我们要对关于各种具体的经验的情形——包括全球化——中的制度变迁性质的各种竞争性主张做出判断,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的关键。同样,如果我们要检验那些试图解释各种制度变迁模式的理论,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的关键。

其次,制度主义者往往依赖于因果解释,但是并未明确说明制度变迁的基本机制或过程。其结果是,这些因果解释概念类似于神秘的黑箱,我们还需要打开这些黑箱并检查其中的内容。只有我们打开这些黑箱,那些承载各种主张的模糊概念才会消失,而对制度变迁的各种机制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Hedstrom Swedberg, 1998a; McCloskey, 1985),特别是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在面对批评者指责他们忽视了这些机制,从而损害了制度主义主张的经验与理论可靠性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Hirsch & Lounsbury, 1997; Hirsch, 1997; Knight, 2001)。例如,如果忽视制度变迁的基础性机制,也会损害制度主义关于全球化的主张的可靠性。第3章就是要更清楚地思考制度主义者所使用的那些最重要的因果概念背后的基础性机制,该章特别关注路径依赖概念和制度扩散概念。此外,该章还简略地讨论了其他内容,诸如制度如何发挥对行动的驱动(enable)、赋权、建构和限制作用等。总之,如果我们要提出关于制度变迁的更严密和更令人信服的主张,那么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显得十分的关键。

第三,近年来,许多制度主义者已经接受了一种文化转向,简单说来就是逐渐为思想观念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一样都可能促使制度发生变迁。“规范、知识范式、政策框架、世界观和其他思想观念是否影响制度变迁”这类话题,是近年来各种新的研究议程的热门话题,也是那些从事比较分析、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制度主义者的热门话题。^[7]然而很多制度分析者,对于这些话题的研究显然不够,甚至画地为牢,因为我们关于思想观念的研究,受着概念与方法论问题的困扰(Blyth, 1997; Finnemore, 1996; Yee, 1996)。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思想观念”,以及“思想观念影响行为的机